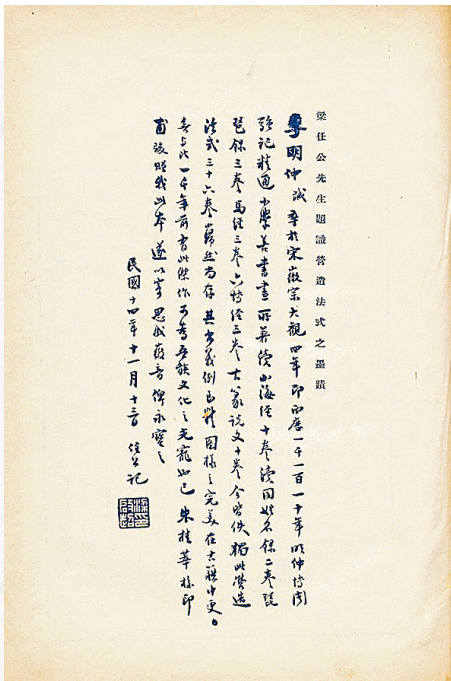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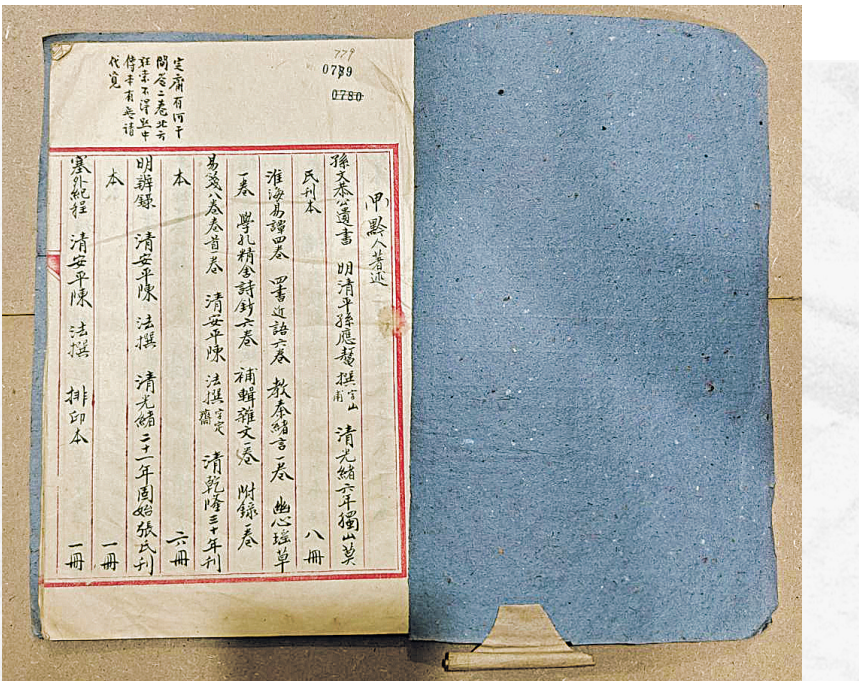
【文化讲坛】



朱启铃像。



梁启超题跋《营造法式》。



《朱启铃藏黔籍目录》抄本内页。

【时讯】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档案展”  
专题展览面向公众开放



图为展览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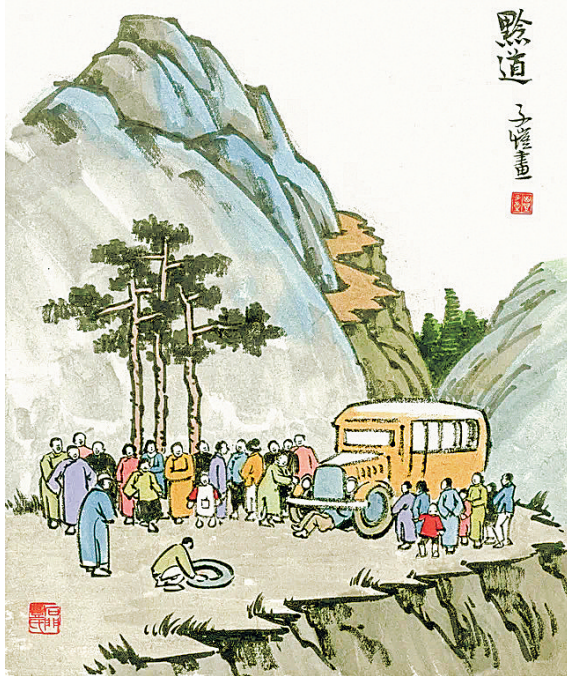
新华社电 8月15日,由中央档案馆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联合主办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档案展》专题展览在党史展览馆四层专题展厅面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将大量珍贵档案成组展示,深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

展览分为八个单元,展出了340余份珍贵历史文献档案,内容包括抗日战争重大事件档案、重大战役战斗档案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笔起草的书信、讲话、题词等资料,全面展现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抗日军民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突出贡献,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展览旨在通过珍贵历史档案,让广大观众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励人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展览将展出至2025年年底。

“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展”  
在筑举行



丰子恺在贵州创作的《黔道》。

本报讯 8月12日,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山河万里——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由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与丰子恺研究会联合主办,50幅丰子恺抗战题材原作画作汇聚一堂,生动再现烽火岁月中不屈的民族精神。

展览分为“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以笔当刀”“中国就像棵大树”三个板块。展览特别聚焦丰子恺与贵州的深厚渊源。1939年12月至1942年11月,在贵州期间,丰子恺以笔为枪,他的《急转直下》《黔道》《贵州的黄包车》《遵义的负重》《警报作媒人》等画作和文章为抗战呐喊,这些作品也展现了抗战期间贵州山城的社会景象。

丰子恺研究会理事、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本次展览策展人裔萼阐释了此次展览的“三个第一”：“这是丰子恺先生作品首个抗战主题展览,也是丰子恺先生作品展首次走进贵阳,更是《大树画册》第一次亮相贵阳。”

据了解,贵阳作为丰子恺战时流亡生涯的重要节点,此次“山河万里”特展以其独特的历史维度和情感深度,为这场跨越时空的艺术纪念增添了不可替代的一笔。

本次“山河万里——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展”将持续至9月7日,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舒锐 文/图)

贵州两作品入选中国文联  
2025年重点创作目录

本报讯 中国文联2025年重点创作项目目录项目日前公示,其中扶持类项目9项、支持类项目16项。我省文艺界创作的歌曲《黔岭歌飞》、杂技剧《脊梁》分别入选支持类、扶持类项目。

贵州文联推荐的《黔岭歌飞》合唱作品,以多姿多彩的贵州民族文化为核心主题,巧妙融合汉族、苗族、布依族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以悠扬乐章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多民族大融合的文化交响;中国杂技家协会推荐、贵州省杂技团制作的当代大型杂技剧《脊梁》,以贵州交通建设为题材,将杂技与舞蹈、戏剧、魔术等艺术形式相融合,艺术呈现了贵州“万桥飞架”造就“高速平原”的奋斗之美。

据介绍,中国文联重点创作项目目录项目从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出发,旨在推出一批反映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文艺精品力作,推动文艺创作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台阶。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 郑文丰)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做客“贵博讲坛”——

谈朱启铃“沟通儒匠”论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日前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的“朱启铃先生藏民国老照片捐赠仪式”上,贵州乡贤朱启铃生前珍藏的43张近百年前的黔地照片“回家”,“朱先生是没有到过贵州的贵州人。这批照片,是先生寄托乡愁的藏品。”捐赠促成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说。活动当天,他还应邀做客省博物馆“贵博论坛”,作“朱启铃‘沟通儒匠’论探义”的主题讲座。

王军与朱启铃先生之间有着“隔着时空”的深厚渊源:他是开阳县金中镇人,与朱启铃的老家开阳双流镇相距6公里;他24年新闻记者生涯致力于建筑历史与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代表作《城记》回顾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首都建设的历程,并穿插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一批建筑师、规划师的人生故事,朱启铃则是这座城、这群人背后绕不开的人物;2016年,他调入故宫博物院研究院,从事古代营造制度及文化谱系的研究,试图揭示紫禁城的时空格局,进而解读北京城的价值。1925年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只包括紫禁城的后宫部分,紫禁城的前朝部分已于1914年辟为“古物陈列所”(1948年并入故宫博物院),朱启铃为倡立者。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又“遇见”了先驱朱启铃。

讲座上,王军先生简要回望了“紫禁城”向博物馆转变、北京古都在近代化营建过程中,朱启铃先生所发挥的作用。继而从中国古人测量时空的“观象授时”切入,将朱启铃试图融合经学、匠学以研究营造学乃至整个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溯源至天文历法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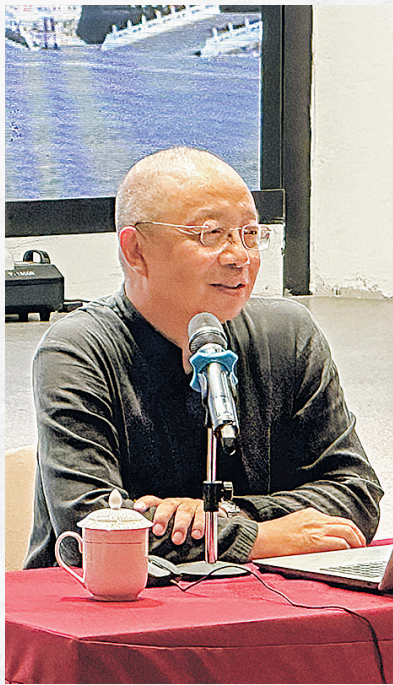
“沟通儒匠”的提出

1930年,“研究中国营造学已二十余年”的朱启铃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其研究方法,在他1930年发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和《社事纪要》中有明确表述。”王军说,二文明确了“沟通儒匠,凌发智巧”的研究方法,以及诸多实施计划。计划包括:一、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二、纂辑营造辞汇;三、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四、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五、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在朱启铃看来,对中国营造学之系统研究,须“一洗道器之分涂、重士轻工之固习”,“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究,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所谓“李书”,即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的《营造法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罕见的贯通经学与匠学的建筑巨著。朱启铃于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即将之石印出版,后又参校诸本,于1925年刊行陶湘仿宋刻本(简称“陶本”)。“‘陶本’出版后,朱启铃赠给梁启超一部,梁启超将该书转寄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的梁思成、林徽因,望其珍视传承,‘俾永宝之’。”王军说。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后,梁思成、刘敦桢加入学社,以华北地区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古建筑测绘调查,梁思成发现隋代赵县安济桥、唐代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进而释读《营造法式》大木作模数制度,溯源至唐辽建筑实物,指出其与西方古典建筑类型原理一致。王军评价说,此乃东西方建筑史之重大发现,并为朱启铃1925年在陶本《营造法式》序中的宏论——“五洲万国营造之方式,乃由隔阂而沟通,由沟通而混一,气运所趋,不可遏也”,写下了注脚。

王军介绍说,当时营造学社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先导,因“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置规划,鲜涉殿堂之结构”,而《营造法式》广记结构技术,在中国古代匠学著作中独树一帜,若不率先结合建筑实测释读,研求其读法、用法便无从置喙。尽管营造学社



嘉宾名片

王军,1969年生于贵州省开阳县,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长期致力于北京城市史、梁思成学术思想、城市规划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工作,著有《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历史的缺口》《龙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天文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奖、中国出版集团奖、中国建筑图书奖、美国建筑师学会香港分会年度表彰、文化遗产优秀图书奖等。

的重点在结构技术上,但学社成员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经学仍景仰有加。

1943年梁思成与梁启超《中国建筑史》,在绪论中将朱启铃之“沟通儒匠”发展为“结构技术+环境思想”,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但梁思成对所著的《中国建筑史》并不满意,认为其仅“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建筑之见于古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置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梁思成这些定义了建筑平面规划的环境思想因素,皆关涉中国古代经学的核心要义。惜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他未能推进对环境思想所涉及的中国古代经学之核心要义的研究。”王军说,时至今日,在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领域,如何“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凌发智巧”,仍是待解的难题。

对经学与匠学的再认识

1930年朱启铃提出“沟通儒匠”之时,普通教育废除经学已有18年,科举制度废除24年。王军介绍,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干,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于1912年10月颁行《大学令》,取消了经学科,将其分入文科相关门类,且史学未被列为独立学科。

“重新认识经学、匠学,对理解朱启铃先生的‘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凌发智巧’很有必要。”讲座上,王军从狭义、广义两方面界定了中国古代经学,“狭义而言,指儒家之经典著作,至宋代定为十三经;广义而言,则包含诸子百家经典著作。这些经典著作,乃中国古代学术不可动摇之根基与主干。”

“中国古代匠学,乃工匠之学。”王军认为,匠学本为经学之一部,十三经《周礼》(亦称《周官》)之《考工记》即记匠人诸作法式,这本书之后,匠学与经学逐渐分离。对此,朱启铃有这样的论断:“窃我国营造之学,肇源远在三代。”王军进一步将中国古代营造学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一万年前,中国所在地区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不断累积、演进,蔚为大观,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

他从考古学出发进行了诠释: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发展有两大重要现象,一是以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出现大规模农业剩余,其地下发现约120吨稻谷;二是以距今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为代表,建造了大规模都邑和水利设施,其水利系统受益面积达100平方公里,筑有高坝、低坝、长堤,是人类最早最完备的水利系统之一这表现,文字诞生前,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测定和管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且时间测定以空间测定为基础,由此形成的时空密合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字产生后,这些知识思想被载入文籍,如《周髀算经》的圆方图、方圆图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上可见,《淮南子·天文训》的二绳等图式在六千年前的西安半坡陶盆口沿上能见到。这些图案体现的先人时空规划能力,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符。

“测定时间与空间对于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支撑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观象授时体系,不仅独创出二十四节气直接服务于农业生产,而且塑造了时间与空间密合的人文观念,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石。”王军认为,中国古代的天文观测可概括为“昼测日影,夜观星象”“惟王建国,辨方正位”,据前者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西南北,进而掌握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获取一个回归年的时间长度,观测体系展现的“中”字象形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村镇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决定性影响;对应二十八宿的风水四象,与城市、村镇、建筑浑然一体,构成一幅幅平铺在大地的天文图,见证了中华先人规划时间的卓越能力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此种时空观对建筑制度的影响,突出体现在时间统领空间的设计,由此形成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时空法式,在紫禁城与北京城的时空规划中有着经典体现。

“农业生产关乎社稷与民生,相关知识思想早有记录需求。文字出现前,物件、色彩、数字等原始记事方式应运而生,如新石器时代建筑遗址以比例、开间、色彩表达文化意义。这类方式并未因文字诞生而消失,反而成为更稳定的体系,经匠人传习塑造出富含美学与文化的建筑形态。”王军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原本混为一气的知识与思想析为百家,以至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感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也正是基于此,朱启铃看重对《营造法式》的研究,认为该书可以“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正如他所言:“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

王军表示,《营造法式》卷一、卷二为《总释》,朱启铃称其“凡建筑上之通名,群书所恒用者,荟集而诠释之,以求其正确。附总例,则以说明算术定例,及当时

功限格令等”,即以名例为先导,由小学(古代文字学)、经学而入匠学。“小学是经学的基础,《营造法式》以‘内四十九篇’贯通小学与经学,进而深入探究工程制度,这是经典的治学路径。由此可见,经学研究是中国建筑史及营造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他说,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虑,朱启铃于1925年创立营造学社,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以《营造法式》的研究为中心,广募贤良,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中国建筑史研究之辉煌篇章,由此翻开。

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

“朱启铃并非《营造法式》最早的发现者。”王军介绍说,早在190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今沈阳)已抄录了文溯阁存《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伊东忠太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对《营造法式》作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他甚至断言:“研究广大之中国,不论艺术,不论历史,以日本人当之,皆较适当。”

“如此草率的断语,当属日本学人‘解释困难’而导致的误判与偏见。”王军说,这不但限制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深度,还对一脉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消极影响。相比之下,朱启铃1918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论世”,“瞥见此书,惊异宝爱。亟以付之影印,传播始渐广”。

王军介绍,至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朱启铃对《营造法式》之研究,“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然其大体,已可句读,且触类旁通,可与它书相印证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铃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渐多”。彼时,他已能疏证《营造法式》十之八九,大体上已能句读,并触类旁通,与它书相互印证,他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为学社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支撑;此外,他在研究计划中遵从由小学入经学之路径,将营造辞汇之纂辑作为先行事项,再依匠学与经学之研究体系,设法式、文献二组,延揽梁思成、刘敦桢入社执掌,开启中国建筑史研究筌路蓝缕的征程。

“在朱启铃设定的营造学研究范畴之中,建筑史研究只是一端。”王军说,他整理出版《三几图》(燕几、蝶几、匡几),是为家具之研究;又搜求、整理、出版《髹饰录》,是为漆艺之研究;又校刊《梓人遗制》,是为机械之研究;又编印《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是为织绣之研究。朱启铃认为,“夫所以为研求营造学者,岂徒为材木之轮奐,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观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循此以读群书,将于古代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左右逢源,豁然贯通,无不如示诸掌。岂惟古代,数千年来之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亦奚不由此,以得其源流,以明其变迁推移之故”,“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之营造不可”。

王军说,朱启铃先生“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研求实质之营造”的召唤,为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